

四部文明

文懷沙 主編

秦漢文明卷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一)

Z422
11
2

文懷沙主編
秦漢文明卷

四部文明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一

PDF
知
學
堂



四部文明總序

憶在五十年代之頃，余嘉錫先生（故友周祖謨教授之岳丈）一夕以病殘之身垂顧荒居，談及《四庫全書》之匯書、纂書、毀書、禁書；并許我為並世之『有識之士』，還說所謂『識』指『見識』、『學識』和『知識』，『知』之高明者曰『智』。余翁說：『文先生，你是我心目中罕見的「智識分子」』。這位老輩使後生文某既惶恐又感激。正是這位老純儒（他不是名流）不可磨滅的感召力，助我渡一切苦厄，乃至老來也不敢懈怠，遂立志修纂《四部文明》。

壹

『四部』之名，起於晉初，荀勗、張華等，編列晉室所藏書籍，分為四部。及晉移江左，藏書淆亂，李充刪除繁冗，雖仍分四部，而內容稍異於前。於是甲部為

經部之屬，乙部爲史部之屬，丙部爲子部之屬，丁部爲集部之屬。降及李唐，玄宗於兩京各聚書四庫，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爲經史子集四庫，四部之名遂沿用至今。此乃從文獻內容分類，《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等皆據此分類而纂集。茲者與以往所稱「四部」不同，《四部文明》之「四部」乃因歷史時序，將中國歷史前半期之文明成就以時代劃分，歸併爲《商周文明卷》、《秦漢文明卷》、《魏晉南北朝文明卷》、《隋唐文明卷》四部叢書，是爲《四部文明》。

貳

古埃及、兩河流域、古印度及中國，爲舉世公認之人類文明發源地。中華文明，不惟發祥至早，而且亙古及今，遞相祖述，四大文明淵源中，綿延不絕傳承如一者，僅我中華文明。在我國五千年文明史之發展歷程中，自古以迄隋唐，是中華文明由奠基、發展、漸趨壯大乃至鼎盛之階段，尤以漢、唐兩個統一的大朝代，將中華文明推向發展繁榮之巔峰。『漢』『唐』遂成爲東方悠久文明中備受世界矚目者。

公元前二十一世紀，黃河中下游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朝，『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哀公七年》），世襲制度由此建立。公元前十六世紀，黃河下游的商部落逐漸強盛，成湯伐夏，放桀於南巢，遂滅夏，建立商朝。公元前十一世紀，周人起於渭水流域，文王

之子武王，渡盟津伐紂，戰於牧野，紂亡，遂陷商都，奴隸制之周朝建立，都鎬京。夏商周三朝，史稱三代。三代是我國宗教思想發生、確立之時期，文化物質文明大抵圍繞國家宗教思想之發展而演進。

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七〇—公元前四七六年），以生產力之發展，封建生產關係逐漸孕育和萌生。人本思想首次突破奴隸制之枷鎖而萌動，春秋末葉，首先產生開派儒家之孔子，隨即產生由墨翟開創、反對儒家之墨家，而後又產生以老子為代表、融會儒墨又批評儒墨之道家，中國社會遂進入思想解放之前夜。

戰國時代（公元前四七五—公元前二二一年），土地私有制逐漸確立，分化於貴族及出身於平民之士族，逐漸形成有影響力之階層，由此帶來了思想領域之巨大創新。思想家輩出，學派紛呈，史稱『諸子百家』。『九流十家』『諸子爭鳴』，促成先秦思想文化繁榮之鼎盛時代。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滅六國，建立起空前統一之多民族中央集權封建帝國。秦帝國之建立，結束了三代以來曠日持久之割據紛爭，標志着古代中國貴族政治之終結和君主政治之確立。在國家制度與文化傳統上，『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奠定未來歷史發展之走向，其深遠意義，二千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偉力。

像秦帝國所向披靡的突起一樣，它的滅亡竟也如此的迅速。它的維持雖然短暫，但強秦終以它劃

時代的氣魄建造了統一的充滿霸氣之國家形制與基礎。就在秦王朝區區十五年間倉促建立之基礎上，迎來了延續三百九十六年持久文明的大朝代，漢朝。

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漢承秦制，是在國家制度之建設方面。在文化上，漢王朝借鑒秦帝國滅亡之教訓，深知文化具有維繫國家穩定、民族團結之紐帶作用。因此漢初在政治經濟上實行『無爲而治』、『與民休養生息』，在文化上，則廣兼容納楚文化、儒家思想之精華，尊崇黃老之學，使文化得到極大的發展，形成漢文化雍容博大、自由闊放之風貌。漢朝文化之極大豐富與發展，在我國文明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繼往開來、融合多元文化爲一體之大漢文化。

秦漢和隋唐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兩個高峰，也都是統一的大時代，在這兩個統一的大時代之前，又分別存在着兩個政治上分崩離析，但思想文化異常活躍的時代——春秋戰國時代和魏晉南北朝時代，此一演變軌跡，顯示出歷史發展輪回之跡象。

自東漢土崩瓦解，魏、蜀、吳三國之鼎立，中國社會進入長達三百六十餘年的朝代更迭、地方割據、戰亂頻仍和政治黑暗之時期。三國而後，歷西晉、東晉、十六國（前趙、成漢、前涼、後趙、前燕、前秦、後秦、後燕、西秦、後涼、南涼、南燕、西涼、夏、北燕、北涼），南朝劉宋、蕭齊、蕭梁、北梁、陳，北朝後魏、東魏、西魏、高齊、後周，中國社會經歷了如此政治沉浮、時局變幻之三

百餘年。

由於政治上的分裂與動蕩，帶來了社會南北融合和多元化之發展，漢代「獨尊儒術」之思想桎梏被打破，漢代經學趨於沒落，魏晉玄學應時而生。更由於佛教之傳入，以及佛教和本土道教之迅速融合，相依相生，魏晉玄學乃獲極大之發展。

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間，持續着儒、釋、道三教之離合紛爭，形成戰國而後又一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的解放，促成文化之空前發展，文學、繪畫、書法、雕塑、音樂、舞蹈等各個藝術門類，都充滿生機，成績卓著。可以說，魏晉六朝既是秦漢大時代文明過後夕陽下絢爛的一抹，更重要的它還是迎接另一個大時代文明——隋唐文明的一綫曙光。

隋唐文明是我國古代文明史上最輝煌之篇章，它是以高度發展和高度發達的文化文明為基礎的大國文明。隋唐文明在人類文明史的發展進程中顯示了極強的歷史穿透力，它的文明更傳播四鄰，在地域文化發展史上亦具有很強的輻射性，產生了廣泛而深遠之影響，其感召力是空前的。隋唐文明曾以長安為起點，通過絲綢之路將中土的文明傳播到西方，同時引進了西方的文明成就；隋唐王朝以長安為中心，將它自身高度發達的文化和具有大國風範的風土人情播散到它周邊的國度；同時，隋唐王朝還成為向東方各國傳播西方文明的橋梁。由此所產生的歷史的影響，使隋唐文明不僅曾經影響了許多國家的歷史，至今還影響着許多國家的社會文化。

叁

中國文化帶着『早熟』與『營養不良』的缺憾，呈現出繁榮與憂鬱之風貌。因為在其衍生與發展的封建歷程中，在以君權制為先導的複雜的社會背景下，所構成的中國文化長期以來在中國社會中從尊崇與被閹割、扶植與受打擊、偽善與良知、放縱與禁錮的狹縫中生長起來。由是之故，中國文化在總結與批判、表現與認知等各方面始終存在着帶有反抗精神的『奴隸文化』與御用的『奴才文化』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紛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便是『文章西漢兩司馬』，一方面是『述往事，思來者』以『人民性』來批判歷史的一代史炳司馬遷，另一方面則是被漢武『倡優蓄之』，以『歌功頌德』為能事的司馬相如。這一傳統一直延續下來，到愛新覺羅王朝更用其極。秉承着滿清王朝為維護統治需要而修纂《四庫全書》的紀曉嵐，堪稱清三百年『奴才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們在纂修《四庫全書》的整個過程中，對中國古籍進行了最大規模的毀滅、閹割、篡改和歪曲，留下的就是那部充滿統治者滅裂中國文化陰謀的《四庫全書》。至今還讓『現在中西的學者們，幾乎一聽到《欽定四庫全書》這名目就魂不附體，膝彎總要軟下來似的。』（魯迅語）

肆

清代乾隆帝武功煊赫，他晚年爲誇耀他在位六十年來的十次武功，自詡爲『十全老人』。除了武功，他還要顯示其文治。他循安徽學政朱筠之議，擬在全國範圍內網羅歷代遺書，并計劃據之編成一部曠世鉅典。乾隆帝選派學者在北京翰林院着手，并令於辦成時名爲《四庫全書》，設館經辦全書事宜。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諭內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

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爲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稽古右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歷代流傳舊書，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覈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爲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沈潛經史，原本風雅，……亦各有成編，并非勦說、卮言可比，均應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爲給價；家藏者，或官爲裝印。其有未經鐫刊，祇係鈔本存留，不妨繕錄副本，原書給還。并嚴飭所屬，一切善爲經理，毋任吏胥藉端滋擾。

這是誘使全國獻書之始。其上諭雖『辭懇意切』，但各省執政等，大多心有餘悸，因此時過大半

年，全國各省對乾隆帝此一號召，并無響應，故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寄諭各省督撫學政速行購訪遺書并先行將購訪情形奏覆』：

前已降旨直省督撫會同各學政通行購訪（遺書）……迄今幾及匝歲，曾未見一人將書名錄奏，飭辦殊為延緩。我國家重熙累洽一百二十餘年，於今文治光昭，遠暨山陬海澨，徑簾書庫，藏棄甚多，採掇本非難事。其間既屬家傳善本，珍秘有加，然一聞稽古右文之詔，且令有司傳鈔副本，善為經理，當無不踴躍爭先。……各督撫等其既恪遵前旨，飭催所屬，速行設法訪求，無論刊本、鈔本，一一彙收備採。

為了進一步地誘使各地獻書，還同時對於採進與獻書者訂立了三種獎勵之辦法：

一 進書五百種以上者，賞『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一百種以上者賞『欽定佩文韻府』一部；

二 進書中有精醇之本者，由乾隆帝題詩錄副發還；

三 私人進書在百種以上者，載其名於『四庫提要』之末；各省採進在百種以下者，經手採進官員亦載附『提要』。

這些手段仍難奏效，故而乾隆三十八年三月『諭內閣傳令各督撫予限半年迅速購訪遺書』：

各省奏到書單寥寥無幾，且不過近人解經、論學、詩文私集數種，聊以塞白。……當此文治光昭之日，名山藏棄，何可使之隱而弗彰！……揆之事理人情，……何觀望不前，一至於此！必係督撫等因遺編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違背忌諱字面，恐涉手干礙，預存寧略毋濫之見，藏書家因而窺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無謂也！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異辭，或紀載失實，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觀，原不妨兼收并蓄。

……朕辦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於天下，豈有下詔訪求遺籍，顧於書中尋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諭後，仍似從前疑畏，不肯將所藏書名開報，聽地方官購借，將來或別有破露違礙之書，則是其人有有意隱匿收存，其取戾轉不小矣！……予以半年之限，……速爲妥辦……若再似從前之因循搪塞，惟該督撫是問。

其用心手段，已露端倪。在這樣的威逼利誘之下，各省採進工作，有了很大進展。果然一年有餘，全國採進的書籍即達萬種以上，基本上已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這時乾隆露出了他的政治目的。凡是：

一 有種族思想妨害滿清統治之著述；

二 所記歷史事實於滿清不利之著述；

三 思想立場與滿清對立者之著述；

四 被認爲有傷風化之著述；

一律要搜查、禁行，將刻板及其印本全部或局部加以銷毀或挖改，不準流傳。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寄諭各督撫查辦違礙書籍既行具奏』：

各省進到書籍，不下萬餘種，并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哀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況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燬，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至各省已經進到之書，現交四庫全書處檢查，如有關礙者，即行撤出銷燬。

同年十一月初九、初十日又迭下上諭，查禁違礙各書：『寄諭各督撫再行曉諭如有違礙書不

繳後經發覺以隱匿治罪』、『諭各督撫再行曉諭如有悖謬書不繳日後發覺不復輕宥』。

至此，全國範圍的訪書已經大體結束，而全國範圍內的查禁銷燬違礙各書卻貫穿了《四庫全書》的整個修纂過程，僅全國範圍內查禁書籍的上諭就連年不斷的下發。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諭令各省督撫查明如有應禁書版片即解京銷燬』：

違礙書籍，不但印就書本，應行查禁，其版片自應一併銷燬。但恐各省自行辦理，尚未能切實周到。著傳諭……各省督撫，遇有查出應禁書籍，一面將原書封固進呈，一面查明如有版片，即行附便解京，交軍機處奏聞削燬。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寄諭兩江總督高晉等嚴飭所屬加意搜查違禁書籍』：

令該督撫再行嚴飭所屬，加意搜查，務使應燬之書，盡行繳出，勿敢稍有隱匿。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寄諭各省督撫派教官赴原籍清檢違礙各書』。

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寄諭各省巡撫務須實力查辦違礙書籍』：

屢經降旨各省督撫，查繳違礙書籍，送京銷燬。各該省陸續查出應燬之書，雖紛紛呈繳，但恐此等違礙書籍外間尚有存留，而僻壤窮鄉未必能家喻戶曉。……著再傳諭各省督撫，務須實力查辦，不可稍有疎漏。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諭內閣著通諭各督撫予限二年實力查繳違礙書籍』：

著通諭各督撫，以接奉此旨之日為始，予限二年，實力查繳。並再明白宣諭，凡收藏違礙悖逆之書，俱

各及早呈繳，仍免治罪。至二年限滿，即毋庸再查。如限滿後，仍有隱匿存留違礙悖逆之書，一經發覺，必將收藏者從重治罪，不能復邀寬典。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寄諭各省督撫查繳天文占驗妄言禍福書籍版片解京銷燬」。

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寄諭江南等督撫嚴飭所屬留心查訪違礙書籍」。

地方官祇須將應燬之書查銷淨盡，原可毋庸定以限期。……務宜嚴飭所屬，隨處留心查訪，如有應行查禁各書即迅速飭繳銷燬，不使稍有留遺，斷不可稍存懈怠，拘泥期限。

乾隆帝對於燬書禁書，真是處心積慮，而且持之以恆。到這時全國查繳的各類禁書的分量，比不禁的書多十數或數十倍。因為不禁的書，祇要繳進一部，並且中央已有或別省已繳的就不必再繳，而於禁書則須根本芟除，不遺其餘，搜得民間有多少部，就要繳多少部，連同刻板一律繳燬，因而數量更為龐大。民間流行的劇本、小說等，也在搜查之列。於是在《四庫全書》修書期間發生的文字獄即有四十多次，作者、刻書、賣書、藏書者，遭受滅門之慘者不乏其例。

誰曾想到這樣如此冠冕且又堂皇之文化工程，其另一目的便是毀滅文化。《四庫全書》之所在機構竟是使人下獄、被戮和焚書、抄家之大本營，這便是民間學術工作與政府學術工作之最大分野。因為統治者為維持其專制，無論對於任何賦有高尚意義之工作，勢必不會放棄它絕對專制之態度。

試看以下有關《四庫全書》之統計數據：

《四庫全書》著錄書總計：三千四百七十一部 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八卷

不符合滿清政府的標準，採進而不收錄，僅作存目的書：六千八百一十九部 十七萬三千二百五十二卷

爲了編纂《四庫全書》的三千四百七十一部，七萬九千二百十八卷，約九億七千七百萬字的書籍，訪書的時間僅約兩至三年，其後就是長達十九年曠日持久，全國範圍內的查繳「違礙」、「悖逆」之書的活動。僅文化尚屬落後的江西一省，早在乾隆四十一年，查得應「銷燬」的「違礙」書籍即有八千多部。在編修《四庫全書》的整個過程中準確的數字無法估算，但據不同的文獻統計數據來看，至少約有三千一百多種，十五萬部以上的書籍被銷燬，隨之亦創造了有清代文字獄的高峰期，其慘烈倍蓰於秦始皇之「焚書坑儒」。

各省銷燬的書籍，據不完全统计，其中：

蘇州	三四五九〇部	江寧	二八五七一部	江西	二七四八五部	浙江	一四六三〇部
安徽	一四三〇一部	湖北	一〇五二一部	河南	五三七四部	湖南	五一六二部
雲南	二七二八部	福建	一七八六部	直隸	一五三七部	四川	一一五一部
山西	八三五部	貴州	七〇二部	山東	六七九部	廣西	四四五部
陝西	三一〇部	甘肅	三〇四部				

伍

對於清修《四庫全書》的手段和實績，魯迅先生早有中肯的評價：

乾隆時代的一些辦法，是凡以文字獲罪者，一面拿辦，一面就查抄，這并非看重他的家產，乃在查看藏書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別有『狂吠』，便可以一併治罪。因為乾隆的意見，是以爲既敢『狂吠』，必不止於一兩聲，非徹底根究不可的。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尤其是後兩個皇帝，對於『文藝政策』或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治』，却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不過是消極的一方面。積極的一面，則如『欽定四庫全書』，於漢人的著作，無不加以取捨，所取的書，凡有涉及金元之處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爲定本。此外，對於七經，二十四史，通鑑，文士的詩文，和尚的語錄，也都不肯放過，不是鑒定，便是評選，文苑中實在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了。而且他們是深通漢文的異族的君主，以勝者的看法，來批評被徵服的漢族的文化 and 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懼，有苛論，但也有確評，文字獄祇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那成果，由滿洲這方面言，是的確不能說它没有效的。

——《且介亭雜文·買『小學大全』記》

魯迅先生的見解和批判，都值得我們認真的領會和理解。

張元濟先生曾以《四部叢刊》影印舊鈔本與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宋人晁說之《嵩山文集》之

《負薪對》一篇對勘，即可見《四庫全書》滋偽增誤之甚，令人驚悚。至於「賊」、「虜」、「犬羊」、「夷狄」諸字之改竄，竟比比皆是；而抄寫之偽奪，更是在在而有。僅從此《嵩山文集》之一篇，改易已面目全非，足見當日改竄之烈，實出吾人意料。可以毫不誇張地講，《四庫全書》雖云浩如煙海，所收古籍至三千四百七十一部，七萬九千二百十八卷，但沒有一種是可以稱為善本的，數十年來古籍整理之實踐，正說明了這一點；即便是那些輯自《永樂大典》等的佚書，雖無別本可資對勘，但是《四庫》本仍然難以稱善，如《元和姓纂》是四庫館臣輯自《永樂大典》的佚書，直到岑仲勉先生作《元和姓纂四校記》，纔算大體恢復了該書的本來面貌。

民族英雄必須首先忠於自己的民族，正好比為人子者，不容忘懷親娘的養育之恩。這就是中華歷史文明的倫理基礎。一個民族可以建立不止一個國家，一個國家也可以融合若干個民族。漢民族英雄岳飛所留給我們的四個字：「精忠報國」是有着永久生命力的。這個「國」字的內涵既是民族的，又隨着歷史演進不斷變化，不斷壯大。我們清醒地看到《四庫全書》對於漢民族的民族英雄，是抱着抹殺和消滅的態度；以愛國赤誠感染和熏陶了無數代中華兒女的民族英雄岳飛，《四庫全書》對他的事跡隻字不提，《四庫提要》祇說：「事跡具宋史本傳」。經四庫館臣查出的一百八十一種「抽燬」書籍中，涉及岳飛的就佔近二十種，連後人憑吊岳墳，瞻仰岳廟的詩文，也都一概芟除，其水平遠不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殺了漢民族英雄文天祥以後，又大大讚揚文天祥為「好男兒」。在《欽

定四庫全書》中，像岳飛這樣的民族英雄，其事跡，其民族氣節，是一定要消滅殆盡的。僅舉一斑，便足窺全豹矣。

《四庫全書》是在乾隆的親自指揮下，由以紀曉嵐爲首的那些「幫忙」或「幫閑」的「奴才」們，秉承愛新覺羅王朝的「黨性」，對中國古籍進行的一次全面的「清剿」。今天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就是要撥亂反正，以最廣大的「人民性」去反對愛新覺羅王朝的「黨性」，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陸

《四部文明》總計二百冊，其中《商周文明卷》三十冊、《秦漢文明卷》四十冊、《魏晉南北朝文明卷》三十冊、《隋唐文明卷》一百冊。

在編纂整理過程中，主要遵循以下原則：

一、收錄的範圍上，盡可能體現一個時代的文明的整體面貌，最大程度地保存一代文獻。對所有文獻又據其內容進行分門別類，既突出各時代最有成就的方面，又不忽視整個文獻的完整性。

二、古籍整理以「據善本」爲要務，因此我們在對各種古籍版本流傳的情況作細緻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以「罕見」與「實用」爲選擇的條件，確定底本的使用。對流傳稀少的珍善本，和對歷來經